

中文版第二十四期
一九九五年秋季

RC

文化雜誌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婦女特輯

歷史・文化・創作

中外女作家論壇

澳門女史形象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關心澳門請訂閱《文化雜誌》

澳門就是一部文化史冊
 它由兩個民族共同譜畫
 詩人作家和學者們視通萬里
 智慧與靈感令篇章妙彩生花
 歷史默默在字裏行間閃亮
 人文薈萃使精神熠熠昇華
 一頁接一頁請讀者細心瀏覽
 良師益友將為未來留下佳話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二十四期

1995年秋季

每份定價

澳門和中國大陸：60元澳門幣或港幣

香港：80元港幣

其它地區1600士姑度／10美元

全年四期訂價，包括郵費：

澳門、中國——澳門幣或港幣200元

香港——300港元

其餘地方——6000士姑度

38美元

印數：3000本



文化雜誌

RC

文化雜誌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主編

官龍耀

中文版編輯 英文版編輯

黃曉峰 J. 巴斯度

中文助理編輯 葡文版助理編輯

李淑儀 朱立豪

中文版校對 葡文版校對

柳 蓮 F. 利馬

編輯部秘書 秘書助理

高蓮達 施利華

美術主任 攝影

馬偉達 鄧國熙 葉川

編輯部

澳門高地烏街 27 號二樓

TEL : 512280/5993110 FAX : 592002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澳門新口岸海景花園新安大廈 87-47

TEL : 700391

代理發行

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 32 號 G

TEL : 305613, 338561 FAX : 314471

電腦植字排版

澳門東堡電腦排版公司

印刷

國安印務公司



目錄



編者前言

官龍耀 1

• 文化 •

婦女及其在世界上的重要性

韓素音 3

葡萄牙婦女的呼聲

馬加良絲 7

關於婦女問題的報告

張潔 11

兩棲女性

舒婷 14

共譜世界女傑情

張敏 16

女神的眼睛

張抗抗 18

中國文化中的情感表示

馬爾克斯 20

漢字“女”及其語義變化

朱秀蓮 28

神奇的女書

嚴農 33

• 歷史 •

地理大發現航程報告中的婦女

拉伯林托 35

18世紀莫臥兒朝廷中的一位女基督徒

施白蒂 43

皇朝時代中國婦女在法律上的地位

斯卡柏利 50

中國歷史上的女性角色

紀宗安 56

從束腰與裹腳看東西方婦女的地位

艾汀詩 65

澳門近百年華人女傑倩影

陳樹榮 91

• 人類學 •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女性崇拜

阿馬羅 94

不為人知的澳門土生婦女

阿馬羅 100

• 自傳 •

我的奮鬥 我的選擇

樂黛雲 107

當我第一次讀到西方的書

張戎 116

• 文學 •

大陸當代女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

周文彬 121

論澳門現代女性散文創作

廖子馨 133

安娜·瑪麗亞·阿馬羅作品

阿馬羅 152

晴蘭短篇小說

晴蘭 162

• 藝術 •

澳門中葡藝術家的女性主題作品

170

編者前言

官龍耀

正值國際婦女年，《文化雜誌》將本期專門敬獻給這一婦女們的節日，這是格外適時和富有深義的。被冠之為“女性解放”的這一全球現象比以往所有戰爭更加震撼著本世紀。而在東方，這一西方的社會現象亦隨之重演，並且正處於巨大的戲劇性衝突之中。尤其是，產生於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價值觀的現代性，與東方那些幾乎一成不變的偉大農業文明特有的社會人文道德傳統模式之間的衝突，變得更加深刻，對立，而且不可調和。在那痛苦的戲劇性現實之豐富多樣的場景中，噴湧出了本世紀多產的中國小說和電影的靈感之泉，其地位之確認迄自1919年的“5.4”運動並且一直呈上升趨勢。從魯迅到張戎、張藝謀的作品之中，幾百個婦女形象出現在各種小說的大觀園裡，以她們的敏感捍衛著女性在社會中的獨立地位。

在獻給婦女們的本期雜誌中，收集了一組不同尋常的文章。在自古迄今充滿冒險色彩和婦女處境異常特殊的東方世界中，女性的定位，吶喊及其形象延續至今，——被勾畫得維肖維妙。

本期附上不少插圖和作品，從中可以發現女性的豐采，那也是為諸多藝術家特別是被邀請的藝術家們的靈感追求。

從儒家為婦女在家長制家庭中永遠處於奴隸地位所定的誡條“女子無才便是德”，到後來演變為“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豪言壯語，毋庸置疑地都曾經成為中國的金科玉律。

在此，不能不激動地追憶往事，澳門多少代婦女曾托庇於“上帝聖名之城”的歷史舞台，經歷了艱辛歲月，留下了傑作。

這些來自非洲、印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群島、日本和中國的婦女，她們失去家庭的依托，經歷了無窮盡的風險和不斷的覺醒，迎著沉船、戰爭和赤貧如洗的危急，從被拋入慈善救濟院到淪為妓女，這一代又一代的澳門婦女堅韌不拔地追求幸福和勞作，成為純樸英雄業績之主人公。在歷史上，她們表現出了最傑出的集體適應性，她們不懈地適應著風俗習慣、社會禮儀、道德和宗教模式，並在其中創造性地成為折衷主義的最主要因素，賦予澳門社會文化所具有的獨特性。

至少，這一組文章做為歷史見證，是我們應該公正地向她們表示敬意的最好說明。





現代中國畫

新時代

婦女及其在世界上的重要性

韓素音*

在兩個世紀前的1791年，一位名叫奧林柏·高格斯（Olympe de Gouges）的婦女發表了《女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s a Citizen）。這使得始於1789年的法國革命達到了高潮，幾十萬法國婦女參與了摧毀封建王室和土地權貴的起義。這是首次公諸於世的婦女權利文件，它聯同法國革命者曾發表的《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成為歷史的里程碑和法國以及歐洲其它國家民主政府的基礎。1793年，奧



晚唐五代女仕

莫高窟103窟供養人壁畫，西有明筆

林柏和其它婦女又發表了《女權十七條》。其起因是革命當局置誇張的承諾不顧而關閉了“婦女俱樂部”並禁止婦女舉行公眾集會。新的法律稱：“兒童、精神病患者、未成年人和婦女…將不被承認為公民”。這樣，法國婦女所要求的公民權利即被剝奪了。不久，拿破崙當權並且在《拿破崙民法典》中再次肯定了男人對女人的全面監管。

不管怎樣，法國的婦女運動對其它國家的婦女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力。1792年，在美

婦女及其在世界上的重要性

* Han Suyin 1917—1 曾在北京、布魯塞爾、倫敦留學，後在星加坡定居任職醫生並從事寫作，最近十多年專心寫作，在世界上海得甚高聲譽。

國，瑪莉·沃爾斯托尼克拉福特（Mary Woolstonecraft）發表了一篇題為〈女權的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的時事論文。她要求婦女應有受教育和選擇丈夫的權利而不是受父母強迫婚配。這些都是婦女為根本改變當時視男人的支配為自然的政治覺悟的要求。這些早期鬥爭以及19世紀接踵發生的鬥爭在瑪莉雅·羅德斯·萍達仙果（*Maria de Lourdes Pintassilgo*）夫人（1979年始任葡萄牙總理）所著的書內均有論述。

經濟權利主導社會—政治支配，經濟權利在“支配”與“被支配”以及“男人”與“女人”之間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第一次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增強了男性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作為金錢的資本、工廠和機器均操於男人之手，婦女和兒童則受僱於許多工廠，他們每日辛苦勞作14-16小時，僅獲得微薄薪酬。西方國家財富的增長建立在對婦女和兒童的剝削之上。當然，一般男人亦窮得當不成“業主”。正如作家羅格爾·嘉勞迪（*Roger Garaudy*）在其《婦女的到來》（*L'Avenement de la Femme*）一書中寫道：19世紀是“婦女遭遇最凶殘的世紀”。

但是，婦女不願繼續遭壓、持續為平等和人權而進行的鬥爭貫穿此兇殘世紀。我必須提到的是：一些男人亦曾為婦女運動搖旗助瀾。其中最早期的一位是法國人，名叫孔多塞（*Condorcet, 1734-1794*），他於1793年批准了奧林柏·高格斯的宣言並為之遊說。在19世紀，有一位名叫約翰·斯陶特·米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973*）的人又曾為婦女爭取選舉權。1894年，英國政府賦予男人更多的權利（主要給予那些上流貴族和富商，而工人和窮人則幾乎沒有），但拒賦予婦女。為婦女事業奮鬥了25年的米列森特·法賽特（*Millicent Fawcett*）曾提交一份由25萬名婦女簽名的請願書並組織了“全國婦女選舉聯合會”。選舉權即為投票權。*SUFFRAGETTE* 這個詞就是特指主張婦女參選的女子。嘲笑也好，藐視也罷，但它最終成了榮譽的象徵。1882年，《已婚婦女財產法》獲得通過，賦予已經結婚的婦女擁有自己財產的權利。我們不妨留

意一下，法國已婚婦女祇是在40年前才獲得全部掌管自己帳戶的權利。1861年，一些因害怕被毆打、被投監而隱姓埋名的意大利婦女也像英國爭取婦女參選的女子一樣提出了已婚婦女應有權掌管自己財產的要求。在50年前的1945年，意大利婦女獲得了投票權。

在美國，儘管表面上對婦女很“敬重”和“保護”，但存在嚴格的家長支配權並被清教徒的倫理所強化。女人是“脆弱”的，因之需要受指導、受統治和受控制於人……。然而在1848年，一群婦女在紐約附近的塞納卡（*Seneca Fall*）舉行婦女代表大會並按照1776年美國推翻英國的統治、發表獨立宣言、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模式，爭取自由的權利，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在由奴隸問題而引發的南北戰爭期間，美國婦女曾要求獲得自己的權利。由於那場戰爭表面上廢除了奴隸制度，因而亦難拒絕婦女的要求。美國婦女的識字狀況優於歐洲，而工業化的增長更需要婦女從事寫字樓秘書之類的工作。1890年發明了打字機，這更使許多婦女獲得了自食其力的機會，儘管因其技藝較差而賺取較之男人低得很多的薪酬。美國婦女開始成立類似*SUFFRAGETTE*要求平等權利和投票權的婦女俱樂部。各州相繼給予婦女這種權利，並於1920年惠及美國所有婦女（美國憲法第19次修正稿）。

我們不能將婦女革命與歷史事件分割開來。戰爭和革命（如：法國革命、美國革命）確實推動了婦女事業，儘管這不是其初衷。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引致了婦女覺醒的高潮，因為幾百萬英國男人被動員參戰，婦女祇得代替男人去做至今仍被視為“男性”的工作。婦女們駕駛汽車和火車或成為管道工和木匠。她們成為教師隊伍的主力，不僅在一般學校而且在一些大學任教，雖然她們當時的水平尚不算很高。戰時醫院亦吸納醫學院女學生，到戰爭結束時，十四所戰地醫院全部由婦女作業。1918年議會賦予英國婦女投票（選擇）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也影響了婦女運動。法國於1945年給予婦女投票（選舉）權。法國人羅格爾·嘉勞迪寫道：法國作為平等的衛道士是世界上第三十六個給予婦女這種權利的國家。法

國政府也祇得同意男女同工同酬了。然而，我們知道，即便現今在許多國家仍存在男女薪酬的差別，仍期待將來增加僱工。甚至在美國也有薪酬差別，祇是最近才採取法律行動以消除這種差異。

1945年聯合國的建立及其既定目標和使所有國家獨立的聲明開闢了非殖民化的新紀元。一些國家及其原轄殖民地之間的鬥爭激烈了，它們所許下的那些諾言與實際貫徹出現了裂痕。由於許多婦女和男人并肩戰鬥求解放，使得全球的婦女運動更加深入廣泛。綜觀當今世界，婦女要求其權利之聲隨處可聞。聯合國確定1975年為國際婦女年。

在民族獨立鬥爭和婦女求平等的運動中，大概最顯著的應是1949年勝利的中國革命了。

中國革命的一個主要特點是：20年代初，就將中國婦女的解放事業和中國革命聯繫在一起。新中國一成立，第一件事情就是保障中國婦女在所有方面真正享有和男人同樣的權利（1950-1951）。毛澤東說：婦女能頂半邊天。這句話不能簡單地看作是描繪婦女作用和重要性的一行詩句。展開幾十年中國革命的長卷，我們發現早在20世紀初，人們就認識到婦女所受男人的不公正待遇和絕大多數婦女的低下地位（除了婦女生育或成為一家之主）。毛澤東寫過一篇文章，怒斥逼婚現象。毛被一位婦女因逼婚而自殺身亡於花叢中的情節所感動。其它老革命者亦抨擊諸如殺害女嬰和婦女纏腳的陋習。在中國共產黨進行的農村游擊戰爭年代，許多婦女都參加而且大多數都和男人一樣成為「戰士」，因此婦女的解放事業成為政治革命的重要組成部份。過去45年來，中國政府實踐其最初的承諾，堅持不懈地推進婦女事業。一位以不屈不撓的毅力領導婦女事業不斷發展的婦女名叫鄧穎超，她就是受人敬重的已故總理周恩來的夫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傑出女性還有許多。現在，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是一個有實力的組織，它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婦女受教育的權利，相愛而結婚的權利，做母親的權利，同工同酬的權利，所有這些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使是由於經濟發展不平衡，在一些農村仍有倒退現象，我們可以自信地斷言：大多數中國婦女比許多國家的婦女好得多。在中國，有很多婦女被委以部長、

市長、副省長之類的高職務以及企業和公司的負責人，其數量較某些歐洲國家為多。

舊的習俗和傳統很難絕跡，殺害女嬰現象尚未完全消失，由於嚴格實施的計劃生育（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使上述現象復現，在農村更甚之。現已採取對策，允許農民生兩個或多個孩子，以期挽救女嬰的生命。經濟的自由化使一些地區產生了新型「企業家」，而因貪錢，又出現了賈淫並導致婦女和姑娘被拐賣。但政府正在採取行動，嚴厲打擊使婦女事業倒退的企圖。現在，在一些地區出現了祇送男孩子上學而剝奪女孩就學的傾向，此事正引起人們的密切關注。鬥爭仍在繼續，但當我們與其它國家比較時，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令人興奮的。人民將繼續保持四十五年來所取得的成績，清醒地認識到不能失去婦女已贏得的戰果。男女同學教育，從學生時代抓起，這一事業必須堅持不懈地繼續下去。

我們已簡要地描述了婦女為求平等、人的待遇的鬥爭的一些片斷，但仍有必要指出，在當今世界的許多地方，婦女權利尚得不到保障，因此仍需繼續努力。在瑞士進行的研究表明：儘管婦女勞作的工時佔全球工時的三分之二，但她們獲得的薪酬僅佔十分之一（另一研究稱5%）。雖然婦女煮飯供男人享用，但她們自己的營養狀況卻比男人差得多。全世界超過一半的貧困者仍屬廣大婦女，她們約佔世界11億最窮困人口的70%。

在6-11歲兒童中，就學者的四分之三是男孩子，四分之一是女孩子。在發展中國家，女孩子被拒入學的傾向較為嚴重，雖然為此付出很大的努力。比如，印度婦女的文盲率就遠高於男人，80%的印度婦女不識字，男人則為49%。中國在這方面的差距較小：知識男女的比例分別為85%和74%，即不識字者的比例分別降為15%和26%。

我們且不論其受苦難的原因，但有一個問題仍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這就是賈淫。拐賣姑娘和婦女賈淫現象確實存在，它危及著全世界無數婦女的生命的。令人驚詫不已的是，甚至一些最有聲望的機構竟然對隨處可見、日趨嚴重的這類殘酷的剝削現象保持沉默或緘口不言。

壓在婦女雙肩上的最慘重的負擔之一就是違心地多生子女。法國律師吉塞勒·哈莉迷(Gisele Halimi)夫人發起一個稱作“選擇”(CHOISIR)的運動，反對法國政府70年代通過的《反墮胎法》，使婦女有權選擇自己想生幾個孩子。在當今的美國，一些主張維護宗教價值的勢力正在攻擊墮胎診所，甚至殺害實施墮胎的醫生。然而統計表明，許多這類非本意生育是由於強姦所致並且前來要求墮胎的母親都很年輕，有些甚至不足14歲……

口頭上支持婦女是遠遠不夠的。非洲許多政府在進行獨立鬥爭時曾向本國婦女作過莊嚴的承諾，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中一些國家就倒退回祇能稱作封建主義的那一套做法，使婦女的地位降低。不管怎樣，非洲婦女在勇往直前，即使存在困難和危險，她們也會將反對男人支配的鬥爭進行下去並獲得有益的成果。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經濟力量影響婦女解放運動，而新條件下婦女的作用也會反過來影響世界，影響全球經濟變化。我們不久將面臨一個新的世界：由於企業的國際化，貨幣流通自由化和信息、知識傳播電腦化使得國與國之間不再有障礙。

一些專家認為：現在傳統價值正失去其對社會的影響力。新的經濟景象，特別是婦女不再是操持家務的“僕人”、而是在幾乎所有的行業內與男性競爭這一事實意味著“家庭”、婚配成家的觀念正在大大減弱。由於結婚不再對婦女構成安全感，也不能據此而評價婦女的地位，所以想結婚的人正在減少，甚至男女選擇不結婚的數量正在逐步增加。單親比例增加的現象不僅在西方社會有，在發展中國家也可見到。

一些研究結果表明，單親家庭的孩子們表現出心理困苦的症状，在許多“正常”家庭也出現的這些煩惱就是由於忙碌的父母很少時間陪孩子以及孩子們毫無節制地看電視（平均每個孩子每日看電視3-4小時）而造成的。

我個人認為，仍有必要關注婦女作為母親、作為兒童人格塑造者的作用。即便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平等權利、平等就業、平等待遇等，生兒育女、孩童教育及其生活所需仍主要是婦女的責任。這種

負擔對婦女來講非但無害，反而應予加強並視作對社會的重要貢獻。生兒育女的價值遠高於其本身，應該視其為重要的工作而全力支持之，而不應使之成為母親、婦女的障礙或弱點。

發展中國家有一新現象，即離婚和婚姻分裂的數量的增長。其原因大概是過去一直未曾統計過那些家庭生活不愉快又無法公開解除婚約的數目。在這些國家，男人因婦女地位的提高而覺得“受威脅”，進而產生了挫折感和疏離感。男人所受的教育極少使他們有“平等”的思想準備。而中國教育的一個優點是通過學校教育使男孩子明白到，平等對待女孩子對他們有益而不是威脅。不管怎樣，男人的自負心理還是應予理解和尊重的，這意味著幼年的男孩子就應提高這方面的意識。必須教育女子尊重男孩子，而不能把平等視為對抗男性的“武器”。

男女之間的關係均是互相關聯的。現在許多婦女已不再認為操持家務是其主要目標。但我以為，祇有當婦女明白了她作為母親、愛人和教育者對別人的關照具有創造力和卓有成效時，婦女的人格才算完美。

為了改變世界，婦女必須接受有關無私和與他人分享的教育。

真正的平等意味著男、女間相互理解和尊重。這並不是不要愛情，而是加深愛情，增強配偶的創造潛質。祇有明白了作為建設者和創造者的真諦，才能實現婦女自我解放的全部目標。

綜觀本文，我們會發現，大多數高層的決定權仍屬男人專有。男人有害的暴力從戰爭延至今日並且有增無減。各國的軍備預算在增加。除了為自己的權利鬥爭以外，婦女還必須要求在所謂的“全民公決”或“解決國際問題”中享有平等的發言權。我覺得，解決民族或國際重大問題時，必須有廣大婦女的參與。這樣婦女就能以其常有的、較為理性的、實際的和符合“常情”的思維方式貢獻於世，最終使我們的地球真正成為一個和平、繁榮、無衝突或恐懼的幸福的行星，一個所有男人、女人和兒童的家園。

陳殷秀譯

葡萄牙婦女的呼聲

馬加良絲*

一

人們知道，葡萄牙被一種獨裁政治統治了50多年，在這種政治體制的最後13年裡，在其非洲的三個屬地中，有兩個發生了殖民戰爭，直到1974年“4·25”革命才終結了這種局面。在這漫長的幾十年中，葡萄牙男性居民的大部份經歷了三種模式的銳減，這在社會上給葡萄牙婦女的境遇和兩性的社會關係造成了極大衝擊。我說的是男性士兵遠征非洲殖民地，對大量逃兵役的青年男子的政治流放，和這個時期流向歐洲富裕國家的大批移民。葡萄牙男性的這種逃離給婦女的社會文化境遇帶來了意味深長的變化，從前對婦女關閉的機會向她們打開了大門。例如，在農業上婦女承擔起從前祇有男人才做的工作；服務行業新的職位開始提供給她們，甚至在大學裡，年輕的男性軍官因遠征異地，留下的空缺給女孩子，她們開始可以輕而易舉地升學。

在1974年“4·25”革命之後，葡萄牙的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有了重大變化。其中對婦女生活最具有意義的改變，肯定是新憲法和新民法的通過。這些文獻規定了兩性權利的平等。我要說的意思是，除了刑法典的個別條款之外，自70年代末，男女司法權利的平等獲得了承認，這一點在西歐大部份國家尚未能做到。從更高一級的職業層面來說，在公職和自由職業領域，在藝術和教育方面，出現了明顯的革命新氣象，這點不僅體現在真正的平等上，甚至在數量上和各行各業的就業上，產生了新形式的

不平現象，這就是說，婦女相對於男性佔有微弱的優勢。

例如，最新的有關婦女在大學就業情況的統計資料^①表明，同歐洲其它國家相比，葡萄牙社會對婦女有著更高的開放性，婦女的參與性更加廣泛：女學生和女教師的數量大大增加了，她們當中很多人佔據領導職位。1990-91年度的資料顯示，大學55.5%的註冊生是女性，65.9%的畢業證書是簽發給她們的。從這些數字的整體中，將女性所獲各學科學士學位比例單列出來，很重要，因為這些學科以前幾乎全部由男性包攬：

醫學：71.3% 數學和電腦：56.7%
應用科學：67.4% 法學：56%
城市規劃：33.9% 工業生產：67.9%
工程學：30.3%

我們如考慮到同一時期，女性獲得博士學位的資料，就會看到，在精密科學中佔總數的42.4%，在人文社會科學中佔總數的29.7%。現今，在90年代，大學報名的女性所佔百分比似乎有所增加，增加規模甚大，佔總數的68%（這很令人感興趣，似乎已引起葡萄牙教育部的擔憂！）。同樣，在藝術和文學領域，毫無疑問，多類的獎項在頒發上絲毫沒有性別歧視。

然而，雖然具備所有這些開放性，產生了一切變化，現今的葡萄牙社會，仍保留著各式各樣沿襲幾個世紀之久的男權思想，或者說，是一種公然的大男子主義，因為儘管法律構成社會變革的基礎工

*Isabel Algreto de Magalhães, 里斯本新大學女教授。

具，但祇依靠法律本身，並不能改變人們的思想。不能否認，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大量的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無論在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上，無論在中等和低等的薪酬方面或專業工作方面，這些不平等現象可以說微不足道，但卻是實實在在的。

顯然，在政治領域內這一男權主義和性別歧視的態度更加明顯。在政治領域，婦女的參與和肩負責任就差得太遠了⁽⁴⁾，這明顯是因為實際權力在政治上處於競逐衝突之中。在這個權力的領域，男人依然主宰一切，並且似乎還要繼續主宰下去。一旦婦女肩負政治職務，這確在90年代發生了，毫無疑問，其所佔據的職位不僅僅乏人問津且無重要性，更常常是由男性所分配下來的。

我有機會生活在葡國政治生活上男性行動變得最為典型的具體環境中：1979年，瑪麗姬·德·勞爾德·品達西科(Maria de Lourdes Pintasilgo)夫人任總理，她是到目前為止唯一的擔任過此職的婦女。可以看到，面對女性執政時，男人的一種反應。令人感興趣的是，那是一種“正常化的”反應，幾乎是一致的，不滿和恐懼，粗暴和(幾乎)總是非理智的批評。這種反應在政治和社會的不同層面(黨派、社會傳媒等)出現，並使人懂得了那種造成全國半數的男性公民憤慨和混亂的東西：帶有明顯的女性特點的另外一種治理方式，將治理看作是一種“服務”。當時，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這種政治以某種方式重現了“權力的烏托邦”，主要是一種不採用政治的共同見解或控制的革新氣象，將其自身推向缺乏安全感的邊緣，以至令男人們無法忍受，表現出對這種狀況不可調解的拒絕態度。

我們可以自問，如果男人(特別喜歡駕馭一切的人除外)對政治的傾情，並不是主要針對這種即興式的、不可控制的情狀的畏懼，那麼，當婦女進入“男性領地”並擔當權力時，他們就會背叛自己，明顯地將一種業已受到承認的男性治理風格置於受人質疑的地位。

觀察一下最近幾十年的情況是極有興味的。首先，女性政治家的數目明顯增加，而後這一數目卻在同樣地減少著。最近的研究表明(或許這種研究尚不完全精確，卻一樣意味深長)，業已肩負政治

職責的女性(女部長，女國務秘書，女議員等)正漸漸對此種職務喪失興趣。⁽⁵⁾這出於政治體制、政府和政黨的結構以及政治運作的整體方式(嚴格的等級觀念、官僚作風、本位主義、權威崇拜、等等)和各種各樣的制度。除非在這一層面發生徹底變革，否則婦女就不會過早地表現出重新介入政治的熱情——當然，要排除規則所確證的所有例外。

然而，在各個部門中擔任領導性的重要職位、在大學(女學生經常取得優良成績)⁽⁶⁾，目前大批婦女存在的事實令我們不禁對最近幾十年葡萄牙社會的男性-女性關係作出如此的質詢：男性(我們是說在10年或15年之內)還能保持今天所保有的權力嗎！量變產生質變，我們至少從馬克思那裡懂得這個道理。或許，在不遠的將來，在擁有如此之多的高質素女性的葡萄牙社會，即便是在政治領域，必須杜絕今天那樣的唯一一種“語言”：女性的統治。用巴西女作家羅西斯卡·達西·奧里維拉(Rosís Ka Darcy d'Oliveira)的話說，我們會不再“使用男性用語，無論有沒有我們自己的用語”，以便也開始“說女性用語”。從大多數男性的角度看，這仍然是一種無能的表現，也就是說，無論在何種層次上，都是女性對“男性規則”的一種“特別說法”(Sotaque)。不過，大量婦女向決策性職位的進軍，文化和政治的用語、結構、規則將會“非男性化”，這意味著，將不再講述唯一的“用語”，而將使用“雙語”，如此，將展開生活方式和生活交連的新空間。“女性用語”將是另一種主體性的解蔽，或者是另一種身份——女性的表達。這向男性主宰的模式宣佈，女性自身的聲音昇起了，這聲音表現在態度和決定權上，表現在財產分配或地位分配上，表現在生存的意義上，並表現在“與他人的共同在世的存在上”，如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言。

二

為此，我們希望從葡萄牙文學新近產生的作品中對此變化的跡象略窺一斑。這是因為，和其它事物相比，藝術作品作為如此所是的現實的明鏡而湧

現——無論這鏡是扭曲的或者是再創造性的和闡發性的。還因為在某個點上，藝術和文學以某種方式預示著處於萌芽狀態的未來現實。

葡萄牙1974年4月之後的小說，在男性作家但主要是在女性作家中⁽⁷⁾，表現出另外一種認同性——一種女性認同性的痕跡，祇是這種新風貌尚未完全展示出來，幾乎為公眾所不能覺察。

1974年之後的小說，無論男作家還是女作家，我們看到有一種對這些年中葡萄牙社會政治文化現實的特別關注，以及對歷史題材，無論古遠還是近代的獨特興趣。反映4月革命、殖民戰爭、移民、移民歸國、政治流放犯、軍人或衡量評估民族認同感的作品，構成了最近30年來葡萄牙小說的最大篇幅。所有這些作品，有的以親身經歷的方式重現現實，或者以一種魔幻現實主義的敘述方式闡發虛構現實。可以說，男作家和女作家圍繞著相同的題材在寫作。

和西方其它國家的文學正好相反，葡萄牙女作家在描寫婦女——描寫其私人或集體生活時，很少表現出自我中心的傾向（這肯定是葡萄牙4月25日革命以及缺乏意義深遠的婦女運動的結果）。女性作家的文本，揭示出的觀點，理解方法，注意力，知覺和感性的方式，對純理性的一種邏輯性的喜愛，諸如此類等，可以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找到。

請看以下例子：

在許多女作家中，我們發現一種寫作和生活、生活和肉體的緊密結合，而這種結合在男作家的文本中則罕見。由此，可以見到如魏特·仙丹奴（Yvette Centeno）在其小說《源泉》（Matriz, 1988）中的敘說：

我祇記錄那執著於我的事物……它富有穿透力，可以說在我的血液中透過，而不會寫令我停止生活的東西（P.102）。

而蒂歌琳達·傑爾桑（Teolinda Gersão）在《寂靜》（O Silêncio, 1981）一書中寫道：

所說的結語，源於肉體，受到肉體的啟迪（PP.115-116）。

瑪麗姬·伊莎貝·巴羅諾（Maria Isabel Barreno）在《安娜的財富》（O Inventário de Ana, 1982）一書中說：

女性感受事物的一種特定方式：沐浴的時候，愛撫著，所有的手指均殷勤周緻，撫過每個棱角、平面和尺寸……我們保有著這一切：在我們的手中、掌上，有命運和生活的紋路。婦女的人格中留意那些細微的事物，以手輕撫。她們擔憂掂量緊張的企圖，說話和行動前的左顧右盼，都是秩序井然的思索；同哲人散步於幽徑以挖掘和清理思想等值，那是在尋找同樣的謎底。在皮膚那優雅的圖案中，整個宇宙銘刻的循環將得到承認（P.95）。

在特萊莎·莎萊瑪（Teresa Salema）和瑪麗姬·加布里埃拉·蘭索（Maria Gabriela Llansol）以及許多女作家的作品中，也時常顯露出一種對現實的多元理解，一種以所有感官來捕捉實際的感性色彩，我們從《虛無之地》（O Lugar Ausente, 1991）和《有限》（Finita, 1987）兩書中分別選出兩段來說明女性的一種感覺、一種敘說或描寫的詩記或原型：

歷史由皮膚上迅疾即逝的一種光澤、一種獨一無二的感覺的清香、一種瞬間擱置的記憶所界定（P.21）。

混合著皂液，布料浸入水中，那是包裹並保護身體各不同部位的布，或者是窗和傢俱的一種補充；在溶合了香噴噴而細膩的皂液的水面上，浮起了污漬；

迷惘地映照在玻璃和蠟燭上，她的手慢慢晃過，在木板上留下了一抹光芒；

清掃地面是聯接家裡每個房間、聯接白

天和黑夜的路徑；對所有吵鬧、氣味和燈光閉上雙眼，讓它們各安其命；

安柳娜在這間家顛不事的會客室中，希望有人進來，該是期待中的來客：里爾克、孟澤爾，可憐的傢伙……

我們還在這樣和那樣的女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種類似的模型，將其焦點集中在秘密的行為和事件上，它們表面上毫無意義，卻是面對生活最深層的態度的揭示。在利迪亞·若治（Lídia Jorge）的《絮語之岸》（A Costa dos Murmúrios, 1988）裡，作品令我們思索殖民戰爭中男性軍人所遭受的改變／變形的過程。小說告訴我們，她作軍官的丈夫，在里斯本原是一名出色的數學系大學生，卻將眼光轉向莫桑比克的戰爭，當它是一種英雄主義的事業。她告訴我們，因為他喜歡在夜裡照鏡，看到他的傷疤堪與他的上司相媲美，那是他不惜一切代價要做做的模範將軍：

他帶我看他的傷疤，有如向人展示一片風景，一處幽隱之地，好像是走向觀景台拍照。“看到了嗎！”他說。而她暗自想著：你再不是我曾相戀的人，儘管我愛，直到海枯石爛（……）你不再是同一個人。我們並排躺在沙灘上，但是尉官的傷疤將我們彼此分開了（PP.66—67）。

有趣的是，在男性作家的小說中，主要是自1974年起，也可以看到一種有關女性形象的改變。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人物，跟同類的女性作家的小說不同，她們渾身充滿一種新生命力，這種生命力賦予無論個人還是集體的生活以一種微妙的優先權，使她們創造出同他人、自然、際遇和所有事物的新型關係。我們知道，這些人物孕育著處世態度和表達用語層面上的道德與審美革新。她們秉承著一種遠古的知識和秘密的力量（這種知識和力量男

人無法企及），與男人共圖生存（這類人物無論是不是敘述者本人甚至男作家本人）；她們以多種途徑追求一種精神更有內涵更有意味的生活，不僅為她們自己，更是為了所有的人類。⁽⁸⁾

我認為，這些描述在數量和質量上所揭示的東西構成了一種新的跡象，這表現在作為寫作主體和客體的婦女身上，表現在歷史的真實的女性創造者的身上，它照亮了一種公民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新意識。總之，這些女性：女小說家作為生活的一種新維度、一種新倫理、一種新的價值序列的承載者湧現出來，這——誰知道呢？——將能夠在不久的將來變成現實。這將能夠給葡萄牙的集體認同性帶來一種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注入：這肯定是更加豐富的民族認同性，因為包括著女性的聲音，而這聲音直到目前為止，在世界和生活的重大選擇上（幾乎）是寂靜無聲的。

顯然，祇有時間可以證明這一點。

【註】

- (1) 此處所有引用則統計資料為1990-1991年度的，轉引自婦女平等和權利委員會（Comissão para a Igualdade e os Direitos das Mulheres）於1994年發表的研究報告《葡萄牙婦女的處境》，里斯本，CIDM出版（Portugal. Situação das Mulheres, Lisboa, CIDM）。
- (2) 同上，P.9。
- (3) 1960-1961年度，幾乎祇有女性獲得文學博士學位：1979-1980年度，71%的文學博士，70%的精密科學博士，53%的醫科博士。女性博士總百分比的發展情形如下：1960年5.1%；1970年18.1%；1980年33.7%。
- (4) 1994年，證實有大約2%的婦女在地方權力的頂峰，7%的女性議員任職於國會，有2名女部長和4名女國務秘書。
- (5) 請參閱現職女議員馬加利維·席爾瓦（Margarida Silva Pereira）和安娜·貝坦考（Ana Bettencourt）1995年初編寫和發表的書《女政治家及其事業》，里斯本：明德堂出版公司（Mulheres Políticas, As Suas Carreiras, Lisboa, Quetzal Editora），書中有國會許多現任和前任女議員的供詞。
- (6) 近年女學生一直考取高分數，即便在理論物理課程中也是如此。
- (7) 最近20年，葡萄牙女作家和男作家的數量幾乎相當。
- (8) 請參閱約瑟·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阿爾梅達·法里亞（Almeida Faria）、卡多佐·比爾斯（Cardoso Pires）、費爾吉里奧·費雷拉（Virgílio Ferreira）及其他作家小說中的某些女性人物。

呂平義譯

關於婦女問題的報告

張潔*

女士們，先生們：

給我出了幾個題目，我想幾個題目其實可以合起來講。如果我講得籠統，大家還可以提問。

很遺憾，雖然身為女人，但我和中國的婦女組織也就是婦女聯合會從來沒有聯繫，中國婦女聯合會對我也沒有興趣。十多年前這些婦女組織的領導人，大多是中國高層領導人的太太。地方婦女組織的領導人，也常常是當地政府最高領導人的妻子。全國的婦女組織差不多都是如此，在省、縣、農村更是如此。

那時，由於她們的文化教育程度比較低；由於她們的價值又常常是依附於丈夫的地位而存在的現實，她們對婦女運動的理解、觀念也較落後，難免有時從消極意義上去從事婦女工作。

比如在離婚案中，她們不是教育婦女保持自己的尊嚴，幫助婦女如何戰勝面臨的困難和痛苦、建立新生活，而是幫助婦女糾纏丈夫，甚至干涉法院對離婚案的判決。

婦女組織認為祇有這樣做才是對婦女兒童的保護，使他們不致失去丈夫和父親，有一個完整的家。

她們認為婦女在這種時候最好的辦法是哭鬧，以及找丈夫所在單位黨的組織，用尋死上吊的辦法來威脅他們。因為那時中國的法院判案，要聽取單位黨的組織的意見。越是這樣，男人對女人越是蔑

視，他們說，婦女沒有任何本領，祇會“一哭二鬧三上吊”。在中國，男人說到女人時，這是常用的一句名言。

事實上這樣的婚姻維持下去，表面上看來是婦女組織勝利了，保持了一個完整的家庭，可是這個家庭的生活像地獄一樣，妻子為了保持這個婚姻，不得不忍受丈夫的打罵、虐待，過著非人的生活。丈夫的心情也很壞，在外面酗酒，回家打孩子。孩子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很不正常的家庭裡，精神上遭受很大的折磨，對他們的心理產生很不好的影響，是他們未來生活不幸的、重要的潛在因素。

自然中國婦女聯合會也從來沒有邀請我參加過她們的會議，因此我對她們所做的事情很少瞭解。

但從材料上得知，比起十年前，她們的工作有了比較大的改變。我想歸根到底是因為改革開放，促使社會生活也隨之發生了重大的變革。

首先，那些婦女聯合會的官員，大多不再是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太太。

組織的成員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多在各個行業中成績卓著的婦女，成為這個組織的成員。

除了歸女聯合會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在政府的高級官員中，現在也有很多不是靠裙帶關係升遷上去的女性。

據說現在中國有三百多個女市長，還有很多女

*張潔（1937—）中國大陸著名女作家，1960年中國人民大學畢業，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已出版小說散文集《愛，是不能忘記的》、《木舟》、中短篇小說集《祖母綠》、長篇小說《兒童的悲劇》、散文集《在那綠草地上》等，其作品曾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茅盾文學獎等殊榮。本文為作者於1995年3-4月應荷蘭RACA和COS兩組織之邀請所做的《關於婦女問題的報告》簡錄，由作者送寄本刊發表。

廠長、女經理，而且政績不凡。

我想這是因為女人比男人敏銳，感情細膩，能夠體察下級的情緒，善於協調各方面的關係，她們又具有更多的同情心，所以她們比之男人有較強的號召力。而天生的母性又使她們有無私的奉獻精神，她們的溫馨也給下級較好的心理影響。

比如你們可能相當熟悉的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吳儀，就是這樣的例子。

她在中國對外經濟中擔任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完全沒有背景，靠的是個人卓越的聰明才智。在經濟談判中，她是個既有原則又有靈活策略的決策人。可以說，中國和各國之間的貿易取得這樣大的、對彼此都有利益的發展，沒有她的努力是不可能的。西方很多國家的領導人對此可能都有深刻的印象。

此外她還是個很全面的女人，對古典音樂有很深的愛好，常常幫助那些困難的音樂團體尋找經濟贊助人，愛唱歌，而且唱得不錯，會打高爾夫球，大學生時代還是女子壘球隊的隊長。

她是我的朋友，我們常常一起聽音樂會、郊遊，其實我從來不和那種有裙帶關係、掌握權力的人物來往。但她不是，她是我尊敬的一個女性，也是女性的一種典範。

我的另一位朋友徐泓，是個非常漂亮、文雅的女人，擔任著中國新聞社北京站的站長，對重要新聞常常提出不同凡響的見解，切入生活的角度敏銳獨特，如果不是某些新聞環境的限制，我想她一定是世界聞名的記者了。

近些年來，中國婦聯按照《內羅畢戰略》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多數字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此外，我認為中國婦女聯合會最大的變化和成績，表現在對婦女的人格教育方面，這就是她們對中國婦女提出了一個“自尊、自信、自強、自立”的奮鬥目標。

我想這個目標不但比十幾年前的魔法科學，可能在世界婦女運動中也有一項有遠大光明的措施。

我很贊成這一個目標。對於婦女來說，這是一項具有改變自己命運的根本性質的目標。如果每一個婦女能夠真正地做到這一點，我想世界上的婦女

問題就解決了一半。

我對西方婦女運動沒有瞭解，我不知道有過甚麼樣的目標和口號。

但我很想知道的是：世界上還有廣大貧困的地區和國家，《內羅畢戰略》對婦女在這些地區或國家生存包括她們地位的根本改善有甚麼具體的意見？

1979年12月18號聯合國通過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一部份的第六條規定，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措施，包括製訂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販賣婦女和強迫婦女賣淫。《內羅畢戰略》在應特別關注的領域那一部份，第290和291段也提到了婦女被販賣和被迫賣淫的問題，指出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

1989年中國政府也據此制訂了有關的法律和措施，但在很多貧窮的國家和地區拐賣婦女的案件時有發生，難道那些婦女真不懂得她是被出賣了嗎？她們知道。祇是因為她們生活太貧困，她們想用出賣自己的辦法來改善生存的環境而已。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即婦女自身的教育問題。這裡指的不是文化教育，而是人格方面的教育。

由於外部世界對婦女的不公正，婦女組織為婦女爭得平等、公正的努力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是婦女自身的人格教育也是極端重要的，人們卻往往忽略了這一點。

聯合國通過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內羅畢戰略》規定了許多保證婦女權益的條款，作為一種國際公約，由參與國家在它的監督下執行，對提高婦女地位、保證婦女權益做了很有意義、很重要的貢獻。但是它們也都沒有提到這個重要的方面。

事實上，婦女地位的根本改變，不僅僅是外部條件的改善。

很多年前，我在西方演講時已經提請人們注意，如果我們只注意解決社會和男人對婦女的不公正，而不注意婦女自身的人格教育，問題祇解決了一半。

例如賣淫的問題，不論《公約》或是《內羅畢戰略》都祇提到外部世界的強迫性，好像賣淫這個現象僅僅是外部世界對婦女的強迫造成的。

但是，不知大家想過沒有，現在很多女人賣淫既不是由於窮困，也不是由於外部世界對她的強迫。



拼貼作品 馬蒂斯

比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感受到改革開放對國家對個人的好處，很多婦女走出家庭，尤其是沿海地區的農村婦女，在這個開放的時機，表現出絕想不到的才能，成了鄉鎮企業的出色領導人。但也有人從此得出不同的經驗，有些婦女，甚至是受過高等教育、讀過碩士學位的婦女，她們不是抓住這個時機，創造新的生活、展現她們的才智，而是片願做高等妓女。如果到高級飯店，不難可以看到這種有文化、英語很好、周旋在外國商人身邊的高等妓女。

對這種現象，你能說是社會或是男人對她們不公平嗎？你不能。這完全是一種個人的選擇。因為這種生活不用花力氣、不用奮鬥就能輕輕地享受富有的日子。

我也在美國報紙上看到，有記者採訪美國一所名牌大學的女大學生，“如果每夜給你一千美金，

你會不會和一個陌生的男人過夜？”回答是“如果有那麼多錢，為甚麼不？”

還有記者採訪一家名牌大學的女大學生：“願意為《花花公子》雜誌封面做模特嗎？”回答也是肯定的。因為報酬很好。

這種問題十幾年前我在小說《方舟》裡已經說過。有些婦女自己就不把自己當成和男人一樣的人，而是把自己當做供男人把玩的“性”，並以此做為謀生的手段。如果用過去的老眼光來解釋，就會解釋不通，她們並不是因為生活貧困活不下去，像維克多·雨果在《悲慘世界》那個故事裡說的那樣，貧困逼得一個純潔善良的女孩子不得不靠賣淫來維持生活，而是要輕鬆地享受富裕的生活。

看看你的周圍，就是在很高級的公司，女僱員自己願意當“花瓶”的有多少？從前我在奧地利薩爾茨堡的一家銀行，看到過一個“花瓶”，人們告訴我，別看她甚麼也不會，可是她對銀行業務的發展作用很大。

女人究竟是“人”還是“性”的問題，是兩性關係不平等的一個古老的、重要的、幾乎像歷史一樣長的原因。

如果我們婦女自己對此沒有覺悟，還能要求社會和男人對我們怎樣呢？

你要是勸說她、教育她，不要自輕自賤地把自己當成供男人玩弄的“性”，她可能還覺得你是傻瓜，那樣簡捷快當的辦法你不用，非要自己去奮鬥，多麼的辛苦。

還有些婦女，就是不願意獨立，總是以男人為她們世界的核心、她們生存價值的體現，離開男人就覺得無法生存下去。雖然這和她們經濟不能獨立有很大的關係，但和她們不夠健康的心理狀態也有關係。

不論《公約》或是《內羅畢戰略》為提高婦女的地位、保障婦女的權利做了多少的努力，但，不改變婦女貧困的現狀，不注重婦女自身的教育，恐怕也是事倍功半的。

這就是我非常贊成中國婦聯對中國婦女提出“自尊、自信、自立、自強”這一奮鬥目標的原因。

謝謝！